



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 [1] ——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

郑杭生

纵观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他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就我看来，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

一、成绩卓著的 sociology 中国化

就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来说，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他对 sociology 中国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仅和当时社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实际上开拓了一条 sociology 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那时基本照抄照搬西方的局面，而且还以他的出色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 sociology 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代表作：《江村经济》(1939)与《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与《乡土中国》(1948)等。

其中，《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主要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曾指出，《江村经济》作为社会人类学的著作，对该学科传统的突破主要在于，(一)它没有拘泥于异民族，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如果说布·马林诺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二)它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1][2] 正因如此，马林诺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称赞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禄村农田》一书所研究的禄村，和江村相比，尚处在开始受工商业影响的初期，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以农田生产来维持最低的生计。《禄村农田》是《江村经济》的姊妹篇，同样采用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研究法。但《禄村农田》研究范围较《江村经济》狭窄，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这样，反而抓住了农村社会变迁的主要方面，且有利于深入探讨。此外，《禄村农田》理论解释与事实叙述并重的写法，与《江村经济》注重事实的叙述相比，也更符合社区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现代社区研究方法的特点与要求。[2][3]

《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则是在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的

基础上进行社会结构的研究，以从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从《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到《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应当看作是从实地社区研究到社会结构研究的提升。毫无疑问，这种提升对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生育制度》是以生育制度为核心，探讨中国微观社会结构的著作，是一部家庭社会学专著。《生育制度》一书从社会本位文化观来分析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与性等各种问题，基本上符合当时乡土社会的现实。它也是比较全面地体现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分析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之作，代表了费孝通先生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费孝通先生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是有开创性的。

费孝通先生在他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乡土重建》后记中，这样来说明他所经历的学术探索之路以及早期研究受到的种种限制：“我最早是读人类学的。从人类学里我发觉要去了解人类的生活，最好是从比较简单的标本下手，所以我第一次实地研究的对象是广西的瑶民。从广西回来，我才着手研究比较复杂的乡村社区。最先是挑定我所熟悉的家乡。抗战开始后，我在云南工作，于是集中力量去研究内地乡村。从乡村的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所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找求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都会，我还不作任何具体的研究计划。但是我明白如果不了解乡村以外各种性质的社区，很容易象摸象的瞎子，把象形容成四个大柱子”。[3][4]

费孝通先生对他自己在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也突出了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他中肯地说：“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上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以认为是重要的迈进。他们不是单纯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解释，不是注重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的罗列中国的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的范围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的解释，使我们对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我也许未免过于自信的说，中国社会学经过八年抗战时期，又有了重要迈进，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化和实际化的路上迈进。”[4][5]

总之，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要在现在的条件下，继续加以推进，做出与我们的时代相称的贡献。

二、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就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来说，我个人认为，可以用

“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来概括。

第一，他作为恢复和重建的领军人物，受命于危难之际。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先生，谈及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社会学的事宜，并委托他召集在北京的过去从事过社会学的同志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于恢复社会学的意见。1979年3月15日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通过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选举出的第一届理事会由50名理事组成。其中费孝通为会长，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等七人为副会长。3月19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行了第一届理事会，决定成立研究会的办事机构，由王康任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会务。这次社会学座谈会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这次会议为打入冷宫近三十年的社会学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并对五十年代初取消社会学种种理由从理论上进行了澄清。会议还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在大专院校建立社会学系的工作进行了筹划。因此，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及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开始。从此，中国的社会学事业走上了一条虽充满艰辛，但却是健康发展的道路。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具体工作中，费孝通先生作为领军人物，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面临许多社会学家仍有顾虑的氛围，其所负的巨大责任，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他确定了恢复和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性质和作用。

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里的地位和重新在大学里设立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就这门学科的内容来说，还有待于努力、创建，使之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 [5][6]

从这段重要的话中可以看到费孝通先生关于恢复和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性质和作用观点：1、性质：中国要建立和发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2、作用：中国社会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3、因此，这种社会学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4、因此，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里的地位和重新在大学里设立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

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初就首先遇到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很好把握了这个方向，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学此后健康发展的基础。

第三，他设计了恢复和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的蓝图

我曾当面聆听费孝通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设想。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写道：“1981年11月8日去英时，我有幸在飞机上坐在费孝通教授旁边，因为有关方面和家属委托我在路上照顾费老。一路上，费老谈了许多关于恢复和重建新中国社会学的想法，概括起来叫“五脏六腑”。五脏指培养人才，建立机构等五项措施，六腑指搞《社会学概论》等六本教材。与费老交谈是令人愉快的。” [6][7] 说详细一点，所谓“五脏”指建立社会学学会、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图书资料、刊物和出版社。所谓“六腑”指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要开好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后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之路，基本上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超出费老的设计的大框架。例如，后来，由我担任主任委员的教育部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社会学专业十门主干课，可以说完全保留了费老说的六门课，只是增加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或中国社会学史、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概论、社区概论等四门，并把比较社会学改名为发展社会学。

第四，他强调了社会调查的重要，引导了那一时期社会学经验的或实证的风格。

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当时费孝通先生针对文革十年恶性运行造成的成堆的社会问题，特别强调了社会学要“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刻，提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和及时的”。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进行调查研究：“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法；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较早地有所觉察，有所准备，也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7][8]}从重视社会问题到强调调查研究，其必然的逻辑是突出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形成当时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的或实证的风格。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他为什么不从有思辨传统的欧洲社会学界、而从具有实证风格的美国社会学界请来绝大部分教师，来对中国的年轻学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培训。

费孝通先生不仅提倡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社会学恢复后不久，他即着手对江村的追踪研究。为把这一研究长期进行下去，1981年10月，他三访江村时，明确提出建立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计划，得到江苏省委及有关基层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同年12月，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由京、津、沪、宁等地社会学者组成的调查组即来到江村进行调查。以后，这类调查研究不断进行，到1985年，费孝通先生又组织江村五十年课题组，对江村半个世纪来的变化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调查。对江村的追迹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如费孝通先生的《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这些成果进一步论证了他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的正确性。

费孝通先生四访江村时，“特别看到了农村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1982年决定调查研究作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集镇。在他的努力下，“江苏小城镇研究”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重点课题。费先生宝刀不老，实地开展小城镇研究，并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苏北初探》等一系列著名论文，形成了他另一个著名的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小城镇理论。随着农村改革的步步深入，导致了小城镇及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社会学界对小城镇的研究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费老所有上述这些方面的贡献，都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三、振聋发聩的对社会学性质的新思考

就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来说，这里要特别强调费孝通先生

近年来的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8][9]。这是继提出“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之后，提出的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

关于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的重大意义，我想着重提出两点，即，第一，它可以看作是费老回应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做出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贡献，第二，它表明在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社会学中，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现在有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

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费老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这种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首先，费老的这种思考，是符合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的，这就是要用既对立有统一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处理过去截然对立的東西，其中，科学主义型社会学和人文主义型社会的对立，就是其中的一种。费老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实际上，把这种僵化的对立融化了。保持“科学”与“人文”适当的平衡，对一个国家社会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世界社会学中心重新从美国向欧洲转移的趋势，归根结底是与美国社会学科学与人文失衡、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失衡有关。

其次，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这些人进行重新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在上述思想的展开中，费老提出许多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如：

——要研究天人之际，确立人和自然相统一、相协调的立场；

——要研究精神世界，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

——要研究文化与不朽，提出“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然永远存在，也有整个消亡的)，这种‘死’和‘不死’，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存在?因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群体可以超越了个体的局限”；

——要研究意会，提出“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入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每个

细节发生作用的东西，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很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

——要研究“我”、“心”等等。

总之，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

在费老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费老提出的社会学要扩展的上述基本思想和要扩展的上述基本领域，以及要建立的科学和人文统一的社会学，可以看作是他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遗言。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来实现费老的这个学术遗言。

[9][1]本文在11月1日—3日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与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全文刊登于《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郑杭生：《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第五期。

3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教出版社，2000，第143[10][4]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52-153页。

[11][5]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载《社会研究》第七期，1947年9月18日。

[12][6]《社会学纪程1979-1985》，原载《社会学通讯》1982年第3期。

[13][7]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页。

[14][8]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5][9]下面的引文均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16页。

信息来源：

<http://www.sociology.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 xueshi/2007-11-11/3961.html>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社会学视野网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 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 敬请注明: 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